



历史反思丛书

无秩序中的秩序

急流勇退，明哲保身

时时小心，处处提防

作「良臣」，不作「忠臣」

苦心支撑，力避嫌猜

失掉后台的改革者

反

思



谢天佑

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历史反思丛书

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

丛书顾问: 吴 枫

赵矢元

田居俭

丛书责编: 宋一夫

丛书美编: 王 潇

Zhuan zhizhuyi Tongzhi Xia De Chenminxinli

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

谢天佑 著

责任编辑: 宋一夫

封面设计: 王 潇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5.5印张 2 插页128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第九印刷厂印刷 印数: 1—5 870册 定价: 2.50元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ISBN7—80528—196—3/K·96

编者 献词

6月26/23

1893年10月17日，恩格斯在伦敦给他的俄国朋友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中谈到俄国社会发展的命运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象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恩格斯的话，十分有道理。

我们民族同样经历了许多灾难，可最能引起我们觉醒的、并导致民族思考的、将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的灾难，是“十年浩劫”。

这场灾难，为什么会在我国发生？

已经站起来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

……

是必然，还是偶然，能够避免，还是无法避免，它占据着我们思维的时空，萦绕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

美国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

我们认为：这并非耸人听闻！

历史不会重演。变异的历史——“返祖”的现象却在人类社会中多次地出现过。它并非从前历史的再现，可同以往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经历过苦难，补平过创伤的中华民族对此的痛感要比其他民族深刻的多。所以，也正是我们这样的

民族，发出了由衷的哀叹和心底的呼喊：“中国不能再走弯路了！”

是的。

可中国的路，怎样才能走好？

人们在求索；在沉思。

现实是严峻的。

人类在生存空间方面的竞争远远没有结束——更不会停止。对于先进的民族来说，它的空间会逐渐扩大，而对于落后的民族来讲，则是毫无疑义的相对缩小。

西方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新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现在世界势力的格局正朝着多极世界方向发展。每个国家能否成为多极中的一极，关键看在这场竞争中的表现，可以说，这是一场人力、物力的角逐和国力的较量。

在近、现代的历史上，我们已经错过了许多次发展的大好时机。19世纪末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我们坐视日本跻身列强，自己却坠入苦难深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拉美国家和亚洲的几个国家与地区实现了经济起飞，可我们却陷入“十年浩劫”的泥潭中自相格斗。

疯狂、苦闷，

迷惘、彷徨。

.....

人世沧桑，

国世沧桑，

历史、现实郑重宣告：
中国再不改革，
就要被开除球籍啦！

可见，中国的这场改革，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决定着中国的命运。

这是一场十分艰巨和痛苦的革命。现实又在框定我们，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大国，不仅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而且，我们还必须从现在起，尽快摆脱贫困和不发达状况，逐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其责任之大，负荷之重，是可以想见的。

这场改革能否成功，它的基点是建立在怎样认识中国国情上。应当看到，以往正是由于我们忽视了国情和我们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这一事关决定国家方针政策的基本前提，致使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导致失误和偏差，最后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中国的国情，就是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我们只有把中国的国情了解清楚，才能找出现今社会的弊端，才能决定从哪里改，改什么；只有知道这些流弊是怎样形成的，才能掘其根，断其流，改革才能彻底。

今天的改革与历史上的改革不同之处，改革是全民族的事情。改革的最终目的，使社会得以发展。可社会发展，完全取决于人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讲：经济改革也好，政治改革也好，最终是人的改革。中国的振兴，也就是中国人的振兴。所以，怎样看待历史上的中国人，现今的中国人，中国人将会有

一个什么样的命运，是人们思考的又一个重点。

我们不主张妄自菲薄，同时也不提倡妄自尊大，既不能只看见我们曾有被屈辱和令人痛心的历史而把我们民族看得一无是处；也不能因为历史上曾有远远领先于西方的汉唐时期而沾沾自喜。人贵有自知，一个民族也贵有自知，这是立于不败的前提。我们的先人总结出三种自知的方法：一是“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二是“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三是“以人为镜，可明得失”。这三种办法既看清了人的外表；也看清了人的内在；既可知人的过去，也可知人的将来。这个总结是深刻的，它恰巧与本世纪英国著名学者柯林武德所提出的“历史学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自知”如出一辙，可见这是东西方人们在人生旅途中的共同领悟。

但是，必须看到从明中叶时，我们落后了。经济的落后，政治的落后，文化的落后，归根结蒂为人的落后。从孙中山先生起，政治形态上的革命接连不断，可是对我们头脑和心灵深处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意识却没有很好地加以彻底清算。事业等待我们去发展，我们不但没能使其很好地发展，反而自己搞乱了方寸。“文化大革命”的出现，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要负主要责任，可我们曾参加过这场内乱的每个中国人，能推卸责任吗？而且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全民族的灾难？其道理很简单，就是在我们这样的民族中，有滋生和蔓延这种灾难的基因和土壤。我们不要怕看见自己的不足，人生短暂，岂能总带着不足度过人生。

漫长的历史岁月构筑了中国的独特风貌，也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特有品格。我们必须对我们国家、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今天中国的历史背景，明天中国的发展走向；才能分辨出在我们民族身上蕴藏着多少动能和

携带着哪些阻力；才能最终使每个人得到发展和社会得到前进；才能迎接世界新格局的挑战！

人们习惯说：“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可走向现代化，首先是走出落后；走向世界，首先是走出中国；走向未来，首先是走出现在，这都关涉着一个起点的问题。

人们在前进，也就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这种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地、或在已经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中国是要走出去的。

这个断言，早在19世纪时一位欧洲人就已经下过。他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一旦这头睡狮醒来，整个世界将在她的脚下发抖！

中国不称霸，但是，中华民族必须站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并且，还要有比现在更尊荣的地位！

为此，我们同香港中华书局联合编辑出版了这套《历史反思丛书》。

她将向人们回答：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为什么由先进变成了落后；怎样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今天中国人的人格与历史上中国人的人格之间有何关系；中华民族如何认识自己起飞的基点；今天的中国应该从历史的中国继承什么、抛弃什么等令人关注的问题。

我们热烈地希望：通过中国海内外学者对我们民族历史的反思，引起广大读者的反思，推动整个民族的反思，最终激起振兴中华民族的勇毅和决心。

作为一个事业，我们由衷地热爱它，但是，我们把所做的一切，仅仅看作是开始。时代给予了中国人这个使命，它要求大家——每个中国人都来做。谁能不相信，也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经过反思后的中国和中国人，将不以一个新的面貌去面向实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呢？

1987年10月于长春

序 言

陈 旭 麓

谁会想到这本书竟是谢天佑同志的遗作，而且是一本未完成的遗作；它的出现早在意中，它的戛然中止却是那样的意外。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我的挽词写了这个难以相信的突发痛楚：

一书方梓行，一书成断简，才未尽也呕心死；
午夜传病讯，午夜惊噩耗，去何速耶挥泪哀。

上联是说他的新著《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已三校待印。而他在高度责任心的驱使下，夜以继日地赶写这本《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忘记了自己旺盛的精力中埋伏的高血压宿疾。下联接着说他病发于4月24日晚间，翌日深夜（已是二十六日凌晨一时五十四分）即逝世，他才56岁。我因得悉病讯较迟，26日一早驱车去医院，他已先7小时去了。“去何速耶挥泪哀”，既痛他的未老先陨，又恨在其弥留之际未获一面。

32年前，谢天佑同志年华方茂，从武汉的华中师院毕业考入华东师大中国通史研究生班。那时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照耀下，史坛纷纷探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他以年轻人的锐气，参预探讨，崭露才思。1959年研究班毕业，留历史系任教，我们得以认识，以思虑接近，论学论事，常相过从，历30年风雨不渝。

谢天佑同志在学术上的造就，是从研究农民战争史展开

的。自60年代初开始，他先后发表了关于农民战争史的论文30余篇，编著了农民战争专史，对历代农民战争的起伏和演进，反复研讨；对农民战争的性质及有关人物的功过，无不畅抒己见，所论富有思辨色彩，更怀着深厚的泥土感情，常说不为千百年受苦的农民说点话，是对历史的失职。当“文革”的阴霾过去之后，他倡议成立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主持农民战争史专刊，多次组织全国性农民战争史讨论会，在风靡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卓然成家，为侪辈推重。

持续的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对封建统治的鞭笞，对传统史学的改造，无疑起过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左”的政治思想的膨胀，楔入学术领域，深透社会生活，“左”成为带普遍性的思维模式。史学上虽以农民战争为纲，取代中国通史的原有构架，并认为只有“反攻倒算”，不存在任何“让步政策”，一凭义愤出发，这就偏离了中国历史的实际。对此，谢天佑同志有执着，也有困惑，然而他日益感到对农民战争史的单线研究，很难研究好农民战争史，认为应推向土地制度、地租制度、赋税制度等课题，研究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史。要有全局观念，才能有机地窥见农民战争史的真貌。随着这种认识的推动，一当“文革”落幕，他便把握开放、改革政策和发展生产力的大气候，立即着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朝代，封建的政治经济进入成熟期，农民战争的兴起几乎与之同步。谢天佑同志即以秦汉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突破口，他重读《资本论》，钻研商品经济的规律，几年间撰写了一批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论文，《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一书，就是在这种思考和发愤中著成的。当他沿着秦汉往下一代代勘察时，又把目光停注于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写出《况钟整顿苏州的官粮和吏治》。

《评王夫之自种自富说》等文，并开始了对明清江南城乡经济的调查研究。看准秦汉为入口，转向明清探出路，抓住两头开展对2000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既具历史的识力，也有现实的波动。但他没有停止在两头，与此同时，又进行了综合的理论的探讨，撰写了《中国封建社会再生产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商品与道德》等文，视野和识力随同研究领域而伸展。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过去，而历史每走一步又都是从现实中来，百年、千年、万年的历史莫不是现实的层垒，纵然逝去已久的历史也还会与现实发生某种联系，返祖与回归是常见的现象。所以，人们的歷史思考并不是远离现实的。“文革”后盛行的历史反思更赋予了这种品性——历史与现实的巨大组合。谢天佑同志有强烈的时代感，有不可抑制的忧患意识，他从农民战争史扩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字里行间不时透露出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辐射。为从历史取得较多的借鉴与激励，他的笔触又展向历史人物和凝结于事理中的心态分析，以读史札记的形式，抒写了《汉文帝好听“狂言”》、《康熙帝的苦衷》、《腹诽罪》一类短篇。1987年7月撰著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则是这种心理分析的系统化，它触摸了千百年的历史神经。文章在《解放日报》的内部刊物《新论》刊出后，为识者赞传，多种理论刊物竞相转载，由内部变为公开，引起很大反响。吉林文史出版社以所论恣肆新颖，请他扩充篇幅，撰作《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专著，纳入该社的《历史反思丛书》，优先出版，在《光明日报》上刊登广告。谢天佑同志在这种要求和鼓舞下，几经构思，制订章目，奋笔疾书，分析从秦始皇嬴政以来君臣间的心机和智术，以及忠臣义士的应对苦心，别善恶，寓褒贬，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

恨与爱。

“历史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约在本世纪20年代诞生于法国，其后传介欧美各国，在开放、改革政策打破封闭体的新时期里才进入中国大陆。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谢天佑同志很快步入“历史心理学”的门坎，从个别到两千年臣民心态的分析，给研究中国历史增添新的养料，做了学术上的开垦工作。

学问是没有止境的，处在科学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新学科层出不穷，老学科分化再分化，一切学问都受到检验。谢天佑同志没有在这里踏步，没有迷惘，而是追上去，拥有它，用以拓宽自己的思路和学殖，这不仅反映于他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并且编织在他多种构思和新著计划中，如果再给他10年、20年岁月，他将会在史学园地里摘取更丰盈的果实。所以，80余岁高龄的戴家祥、苏渊雷两位先生，在亲临吊唁时，以婆娑老人送走中年，为之太息不已。

当我执笔写这篇序言，谢天佑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五个月了。他的真诚的志趣，坦率的言谈，皆历历在人耳目。这本《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虽写才及半，已成的篇章也未能经作者本人最后修订，但其思绪与锋芒真实地表达了作者的胸怀。当前文化事业受到商品价值的强烈冲击，学术著作出版难，吉林文史出版社仍毅然承诺出版这本书，风义可佩。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目 录

一、无秩序中的秩序	(1)
二、主宰一切	(11)
三、喜怒无常	(21)
四、攀龙附凤	(31)
五、明争暗算	(41)
六、急流勇退，明哲保身	(51)
七、时时小心，处处提防	(61)
八、作“良臣”，不作“忠臣”	(71)
九、苦心支撑，力避嫌猜	(81)
十、失掉后台的改革者	(95)

附：

“君主制”与“君主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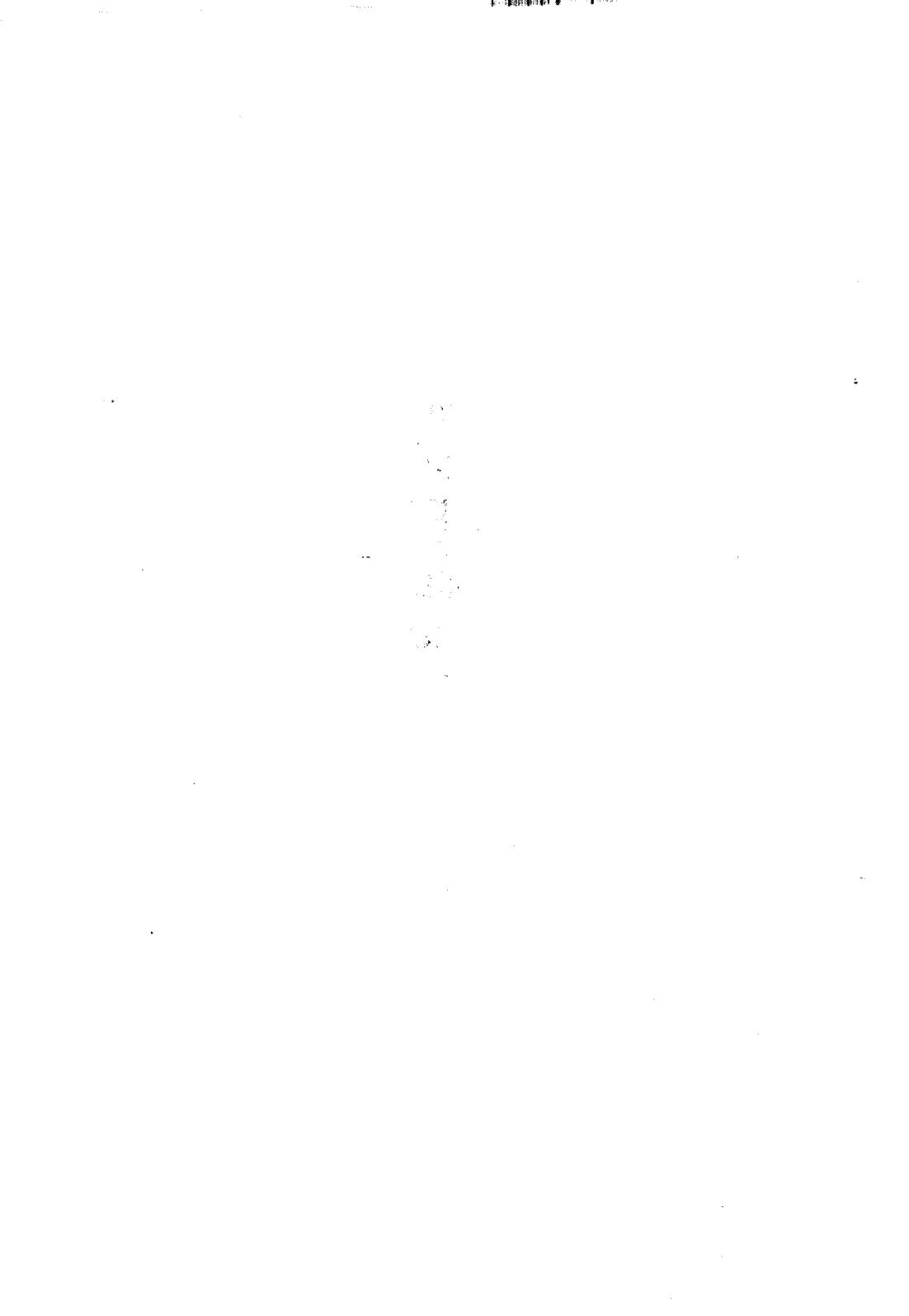
——答洪家义同志.....	沙路 (115)
---------------	------------

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根本缺陷

——读《说苑·君道》	严寸心 (121)
专政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	谢天佑 (126)
陶渊明“猛志”的继承与变异	谢天佑 (131)
郑板桥的怪	谢天佑 (135)

后记	陈翠娅 (142)
----------	-------------

—
无秩序中秩序



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写道：“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这当然有特定的历史规定性，但是从哲理上讲，也适用于中国皇帝。故在这里，加以套用。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五千年前就进入了阶级社会，建立了奴隶制国家。中国奴隶制时代国家政权的形式是分权制，或称“封建制”。实行分封土地，在封地上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封国，各个王国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臣民，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政权系统，封主位世袭，自己任免属下官吏。实权在下、虚权在上，凌驾于各个封国之上的天子，只是名义的共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不过是名义共主权力的体现而已。实际上，各个封国与共主之间关系是松散的。由于封国势力的强盛和共主权力的衰落，封国或者“末大不掉”，或者“问鼎”于共主，或者彼此纷争混战。历史上的春秋战国^①时代就是如此出现的。

平王东迁后，统一的西周王朝统治分裂了，出现了齐、晋、楚、秦等国争霸的局面。据鲁史《春秋》载：224年里，列国间军事行动，凡483次，朝聘盟会凡四百五十次，总计933次。

^①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都洛阳以后为春秋战国时期，春秋因孔丘所编鲁国编年史《春秋》而得名。《春秋》编年从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2年）迄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秋之后进入战国，春秋迄战国始的年代，说法不一。